#### 清华社科文库

# 数字时代的

安全竞争与国际秩序

Security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Digital Age

孙学峰 李 彬◎主编

**消華大学出版社** 北京

#### 内容简介

21世纪以来,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加速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透视数字时代初期国际关系的变化和趋势成为学界关注的前沿领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2020年成立了相关课题组,围绕数字时代初期的国际/地区秩序、国际安全竞争以及对外战略选择等方向展开攻关和研究,本书是课题组过去三年主要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旨在深化数字技术发展影响国际关系的理论认识,推动数字时代国际关系学科的持续发展。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 010-62782989, beiginguan@tup.tsinghua.edu.cn。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数字时代的安全竞争与国际秩序 / 孙学峰,李彬主编. 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3.10 (清华社科文库)

ISBN 978-7-302-64558-0

I. ①数··· II. ①孙··· ②李··· III. ①数字技术—影响—国际关系—研究 IV. ①D81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2023)第183155号

责任编辑: 商成果

封面设计: 北京汉风唐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校对: 薄军霞 责任印制: 曹婉颖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s://www.tup.com.cn, https://www.wqxuetang.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 100084

社 总 机: 010-83470000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 天津鑫丰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5mm×235mm 印 张: 18.5 字 数: 283千字

版 次: 2023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23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89.00元

产品编号: 099329-01

# 丛书编委会

主 任: 彭凯平 欧阳沁

委员:王天夫 赵可金 李 颍

孟天广 戎 珂 刘 嘉

杨雪冬 汤 珂 唐晓阳

# 序言

自互联网问世以来,人类对于数字技术如何影响社会发展的认识在不断深入。最开始人们以为数字技术是通过信息推动社会变化,于是有了"信息高速公路"和"信息经济"的概念。之后,人们意识到数字技术的进步不仅加大了信息传播的速度而且提升了知识增长的速度,于是"知识爆炸"和"知识经济"的概念取代了"信息高速公路"和"信息经济"的概念。随着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简称 5G)的发展,人类活动进入高度依赖数字技术支撑的时期,"数据安全"和"数字经济"的概念又取代了"知识爆炸"和"知识经济"的概念。

上述有关数字时代概念的变化表明,人类对数字时代的认识是一个 从主观猜想到接近客观实际的过程。因此,不断深化数字技术进步对国 际政治影响的认知就成了国际关系重要的研究方向。近年来,我国国际 关系领域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前沿性的成果,《数字时代的 安全竞争与国际秩序》就是典型代表。这本书的研究成果有两个突出的 特点。

一是研究结论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以往许多关于数字时代的研究都是从数字技术的功能演绎推理出数字技术进步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这有点类似科幻电影的思维方式。然而,后来发生的事实否定了这种思维方式得出的许多结论。与此相反,本书中的研究结论都是建立在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基础上,是归纳而成的结论。虽然归纳性结论也有被未来历史否定的可能,但至少符合当下的客观现实,在数字技术没有取得新的重大突破之前,其结论被客观世界否定的可能性较小。

二是研究成果体现出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清华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学术特点之一是注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本书各章的作者均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的教师或博士生,都接受过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充分体现了其在研究方法上的科学素养。

数字时代的大国竞争与以往几千年的大国竞争有一个重大区别,就是竞争的空间从物理空间向网络空间延伸。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前者的范围是有限的而后者是无限的。例如,物理空间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网络空间的数据资源则是无限的;物理空间的大国竞争受到自然地理状况的极大影响,而网络空间的竞争则不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

两种空间的性质差别,促成了数字战略思维和地缘战略思维的不同,两种思维的融合直接影响着大国决策者们的战略选择,大国竞争的行为也随之发生了一些改变。例如,数字技术已经被广泛地运用于军事冲突之中,乌克兰借助北约的网络空间优势使得俄罗斯仅凭借其在物理空间上的军事优势无法获得战争的主导权;大国的发展战略向数字经济发展倾斜,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和欧盟都已制定了数字发展战略;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聚焦于数字技术领域,使得当下的国际秩序不同于冷战时期。

"数字时代"有可能是与畜牧业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属于同一层级的时代概念。倘若如此,数字时代将可能是以世纪为时间单位的历史时期,这意味着当前人类对于数字时代国际关系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有广阔的未知领域在等待着我们去探索。核武器出现于 20 世纪 40 年代,20 多年后国际关系学界才意识到核武器是一种"终极武器",具有防止世界大战的政治功能。数字技术的进步将推动国际政治走向进步还是走向倒退?目前尚无定论。

以往 30 多年的历史表明,数字技术的进步曾与冷战后前 20 年的全球化并行,而 5G 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则与 2016 年开始的逆全球化并行。数字技术的进步与国际政治的走向是什么关系?这是学界须进一步研究的重大问题。具体而言,数字技术进步对国际政治发展方向的影响是技术本身决定的,还是由数字技术与其他因素结合决定的?数字技术推动国际政治进步的条件是什么?其推动国际政治倒退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让数字技术进步服务于人类?如何防范其发展可能导致人类毁灭的风险?这些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

学术意义,也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我相信,《数字时代的安全竞争与国际秩序》的出版必将增加读者对数字技术影响国际政治的新认识,也将会促进国际关系领域更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中来。

阎学通 2022 年 9 月

### 前言

21世纪以来,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加速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时代。在进入数字时代的过程中,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为国家提升综合国力、维护安全稳定以及拓展国际影响力开辟了全新路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以往的挑战与竞争。为此,不少国家(特别是大国)开始努力适应数字时代的安全竞争,与之相伴的则是相关国际规范/制度面临转型压力,国际/地区秩序的变迁与延续也由此成为国际关系学界更加关注的关键问题。为了更好地把握数字时代国际关系的变化和延续性,在阎学通老师的推动下,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从2018年开始关注"数字时代的国际关系"这一新兴课题,并于2020年成立了相关课题组,围绕数字时代初期的国际/地区秩序、国际安全竞争和对外战略选择等方向展开攻关和研究,本书即为课题组过去三年主要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

阎学通发现,在数字时代初期,数字经济在大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 比重大幅上升,网络安全正在成为主要大国国家安全的核心,网络空间竞争 的重要性超越了传统地缘竞争。数字技术竞争由此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 这与美苏冷战集中于意识形态的对抗有着明显区别。在这一过程中,冷战思 维和数字思维将对数字时代的外交决策产生混合影响,进而塑造形成以和平 但不安定为核心特征的国际秩序。在这一秩序下,大国之间难以爆发直接战 争,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将面临更大困难,主要表现包括国家违反协议、相 互欺骗、网络攻击以及技术脱钩等。

刘晓龙和李彬则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例,集中分析了技术标准与大国竞

争之间的关系。传统观点认为,一国的技术优势可以通过国际技术标准不断扩大,美国等西方国家也以此作为散布"中国威胁论"的理由。不过,刘晓龙和李彬发现,技术标准领域的竞争中,"赢者通吃"的说法并不能成立,以技术标准为基础的技术与贸易优势具有暂时性和周期性,单纯依靠某项技术标准根本无法长期获取垄断利益。国家之间的竞争可能导致不同国际技术标准在特定时间内并存,从而导致不同的技术圈子和技术壁垒;技术标准竞争也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政治利益,政府因此愿意介入国际技术标准竞争。但是,政府的介入无法挽救过时的技术标准,也无法长期实现垄断利益。因此,中国企业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的建设是正常现象,西方据此鼓吹"中国威胁论"并无依据。

地区安全秩序是相应区域内国家维持本国安全和地区稳定的互动模式。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东亚安全秩序逐渐呈现出以战略对冲为核心特征的互动模式,即地区内的国家通过有上限的竞争和有底线的合作维护自身安全和地区稳定。孙学峰的研究发现,尽管美国全面打压甚至遏制中国数字技术发展给东亚安全秩序带来了冲击,但中国和其他东亚安全体系内的国家在政策选择上并未脱离既有的安全战略模式。在进入数字时代的过程中,东亚安全秩序展现出较强的延续性,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东亚安全秩序的形成基础并未弱化甚至有所巩固和强化;二是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美国的战略选择和实力特点,使得东亚安全体系内的国家深化与美国的数字合作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其维持既有战略模式的倾向。

军用人工智能近年来成为国际安全领域备受关注的核心议题。李彬的论文分析了军事活动中人工智能的角色及其应用原则。研究表明,在军事活动中机器有时可能会参与判断和决策,从而带来误导或擅权违法,而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迅速发展则增加了军事活动违反国际法的风险。从国际法合规的角度出发,李彬建议,在军用人工智能设计和训练的早期,应将国际法中的相称性原则、区分原则、比例原则转化为操作化的逻辑与算法,输入或者培训人工智能程序。此外,军事指挥官对军用人工智能所作判断和决策的审核也有利于减少相关军事活动违法的风险。

部分安全专家和决策者认为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中的先行者优势显著且持 久。这一认知虽缺乏理论和实际证据的支撑,却可能导致人工智能军事应用 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罗易煊和李彬按照先行者优势传递的逻辑建立了分析框架,进而对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先行者优势进行了理论分析。研究发现,先行者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不同领域中确实具有优势,但优势持续时间均较为有限,并未呈现"赢者通吃"的趋势。因此,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竞争在不同领域虽烈度不同,但都难以一锤定音,而对先行者优势的客观评估有利于逐渐形成对军用人工智能国际竞争的有效管控。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采购、研发和装备军用无人机的行列之中,特别是在中东地区军用无人机不仅实际投入使用的次数最多,其种类和应用场景也十分丰富。目前有关无人机使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安全影响的讨论和预测层出不穷,但大多数缺乏基于现实案例的比较研究,同时在理论层面也缺乏系统的探索和归纳。根据对抗阶段和空中优势归属,佘纲正和罗天宇将军用无人机的使用划分为四种类型。研究发现,在无人机系统所受威胁程度和无人机行动造成人员伤亡问题上,不同类型的应用会产生明显差异,进而塑造攻(使用方)防(目标方)双方应用无人机的选择偏好。尽管四类应用中攻防双方的动机与行为有所区别,但总体看来,军用无人机对国际/地区安全的影响却相对一致,即使用军用无人机会增加军事冲突的频次,但难以提升军事冲突的烈度。

随着互联网日益普及和数字技术的发展,网络胁迫逐渐增加。就网络胁迫能否成功,既有研究提出了两类解释:一是强调网络武器的特性(溯源难、易扩散以及无法直接造成人员伤亡)限制了胁迫效果;二是认为针对同一目标反复发动网络攻击会造成巨额经济损失,从而有助于实现胁迫目标。不过,刘子夜认为,前者无法解释胁迫成功的关键案例,后者则缺乏事实检验和支撑。为此,作者提出了新的解释思路,认为能够损害决策者个人利益的网络胁迫更可能成功,其核心逻辑是搜集相关决策者的丑闻并以之相威胁,决策者会出于保全个人利益而非集体利益的目的作出妥协,从而提升了网络胁迫成功的可能性。研究表明,这一发现同时适用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和拓展了国际关系中的胁迫理论。

数字技术竞争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为维持和扩大数字技术优势, 近年来美国采取了多种措施打压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和全球影响。不过,在

这一过程中,美国的盟国对中国数字技术的态度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融合国内和国际政治因素,孙学峰和张希坤提出了解释美国盟国华为 5G 政策的分析框架和逻辑机制。研究发现,是否认为中美威胁其政权安全是首要的影响因素。如果美国的盟国认为美国对其政权安全构成威胁,这些国家将接受华为 5G;一旦美国的盟国形成中国威胁其政权安全的认知,相关盟国会禁止华为 5G。对于未感受到美国或中国威胁其政权安全的美国盟国,对华为 5G 的政策主要取决于其对中美国际秩序取向的态度。具体而言,不认可美国国际秩序取向或者对中美国际秩序取向持中性立场的美国盟国将接受华为 5G,而不认可中国国际秩序取向的美国盟国会委婉禁止华为 5G(即政府未明确禁止但电信运营商并未选用)。这些发现揭示了美国打压中国数字技术的全球影响及其作用条件和机制,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数字时代大国战略竞争的理论认识。

陈根锋和孙学峰专门研究了美国的盟国对中国智能监控技术的政策选择。研究发现,有关中国对其政权安全影响的认知是造成美国盟国政策差异的核心因素。具体而言,认为中国的政策和行动不利于其政权安全的国家更可能采取限制使用政策;认为中国的支持和合作有助于其维护政权稳定的国家则更可能采取欢迎使用的政策;认为中国的政策和行动对其政权安全没有实质影响的国家将更可能采取默许使用的政策。

衷心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商成果编辑在本书出版过程中专业及时的指导和帮助!感谢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2022 级博士生陈根锋和 2021 级硕士生蔡子慕两位同学在体例编校过程中的辛苦付出!书中的章节此前曾以论文形式发表,收入本书时作者进行了小幅订正。在此十分感谢《当代亚太》《国际安全研究》《国际政治科学》《世界经济与政治》以及《战略态势观察》等期刊或辑刊的版权许可。本书的研究和出版得到了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项目号:2021THZWJC36)和"清华社科文库"丛书出版项目的资助,在此深表感谢!还要特别感谢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Asian Research Institute)蒂姆·邦内尔(Tim Bunnell)教授和岛津直子(Naoko Shimazu)教授对孙学峰的支持和帮助。

孙学峰 2022 年 9 月

# 目 录

第一章	数字时代初期的国际秩序
第二章	国际技术标准与大国竞争 ——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例
第三章	数字技术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
第四章	军事活动中机器的角色与国际法的合规 李 彬 / 83
第五章	军用人工智能竞争中的 先行者优势
第六章	军用无人机的使用偏好及 安全影响
第七章	<b>论网络胁迫成功的条件</b>
第八章	美国盟国华为 5G 政策的 政治逻辑 孙学峰 张希坤 / 209
第九章	美国盟国对中国智能监控技术的 政策选择
索引	279

## 第一章 数字时代初期的国际秩序\*

阎学诵

在 2019 年 9 月 24 日开幕的第 74 届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 <sup>①</sup>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在开幕词中说:"世界有碎片化的危险:世界一分为二,地球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创造了两个相互独立并且相互竞争的世界,每个世界都有各自的主导货币、贸易和金融规则,拥有各自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各自具有零和性的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sup>②</sup> 作为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讲话证实了一种目前普遍流行的看法,即中美战略竞争主导的世界正在形成。然而,中美竞争将会形成一种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因为当下两国进行的主要是数字竞争,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扩张为主的竞争。本章通过分析新秩序与冷战秩序的区别来分析新秩序的特点。

<sup>\*</sup> 本章译自 Xuetong Yan, "Bipolar Rivalry in the Early Digital Ag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3, No. 3, 2020, pp.313-341。中文版首发于《国际政治科学》 2021 年第 1 期,原文标题《数字时代的中美竞争》。

① 本书中国际组织、政府机构中官员的职位,均为文章发表时的任职职位,后同。

② In "World of Disquiet," UN Must Deliver for the People, Guterres Tells General Assembly, September 24, 2019, https://news.un.org/en/story/2019/09/1047172, 访问时间: 2019 年 12 月 29 日。

#### 一、是不是新冷战?

有关中美之间将会爆发新冷战的预言已经流行了很多年。2014年2月21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 vs 中国:这是新冷战吗?》的文章,记者杰夫·戴尔(Geoff Dyer)根据他的观察表示,五角大楼的"海空一体战"概念"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然而"迄今为止,即使将公开的证据推向极端,也难以表明这些做法就是新冷战的宣言"。一年之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达巍认为,中美关系恶化演变成新冷战的可能性在逐渐增大。这位来自中国最大的官方国际关系研究机构的学者强调,"新冷战是指,(中美)经济、社会联系都存在,但是政治上、战略上敌对"。其实,自奥巴马政府于2010年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以来,就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预测中美竞争将会走向一场新冷战。<sup>3</sup>

自 2017 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美冷战不可避免。这份文件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主要挑战者,并判定美国面临的主要战略问题是大国地缘政治竞争,而非恐怖主义。<sup>④</sup> 2018 年 10 月,时任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这一演讲的内容进一步强化了人们有关冷战即将来临的信念。他说,"北京违反国际规范的行为违背了美国利益"。<sup>⑤</sup> 从中国南海领土争端到所谓的中国干涉美国选举,他都批评中国。他那充满敌意的论调让人们回忆起美国过

① Geoff Dyer, "US vs China: Is This the New Cold War?"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20, 2014,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49391156/, 访问时间: 2019 年 12 月 29 日。

② 人民网:《达巍: 中美或滑向"新冷战"需建立长期稳定框架》, 2015年6月6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606/c1002-27113810.html, 访问时间: 2019年12月29日。

<sup>3</sup> Minghao Zhao, "Is a New Cold War Inevitable? Chinese Perspective on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2, No. 3, 2019, pp.373-374.

④ "A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Era,"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18,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new-national-security-strategy-new-era/, 访问时间: 2019年12月29日。

⑤ Alex Ward, "Pence Says US 'Will not Back Down' from China's Aggression in Fiery Speech," October 4, 2018, https://www.vox.com/2018/10/4/17936514/pence-china-speechtext-hudson, 访问时间: 2019 年 12 月 29 日。

去批评苏联时的做法。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葛来仪(Bonnie Glaser)认为:"这是特朗普政府版的'邪恶帝国'论。""在我看来,这就是故意对抗。"<sup>①</sup>

彭斯的演讲内容非常明确,因此很多人将其视为中美新冷战的重要标志。 美国对外政策专家查尔斯·埃德尔(Charles Edel)和哈尔·布兰德斯(Hal Brands)在解释新冷战为何不可避免时表示:"随着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人们开始担心中国和美国正在进入一个新冷战——又一个可能持续数十年的国际体系重塑之战。"<sup>②</sup> 2019 年 9 月,美国前驻华大使鲍卡斯(Max Baucus)说:"我认为我们正处在某种冷战之中,它比上一次冷战更为险恶……上一次的冷战相对简单,因为上次 MAD<sup>③</sup>,也就是相互确保摧毁战略,造成某种透明性。而这次的冷战要困难得多,问题也广泛得多。" <sup>④</sup>

然而,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人(主要是学者)不同意新冷战即将来临的观点。这派学者强调,虽然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都信仰共产主义,但中国和苏联之间有很大差异。在美国公布 2017 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后不久,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尽管美国对华新政策势必对国际政治产生强烈冲击,但它并不意味着冷战必将到来。中美竞争与冷战时期的美苏竞争相比,两者有三个重大区别"。⑤ 耶鲁大学教授、《冷战:世界历史》的作者文安立(Arne Westad)也持相似看法。他认为:"正是这些差异,即苏联当年的行

① Alex Ward, "Pence Says US 'Will not Back Down' from China's Aggression in Fiery Speech," October 4, 2018, https://www.vox.com/2018/10/4/17936514/pence-china-speechtext-hudson, 访问时间: 2019 年 12 月 29 日。

② Charles Edel and Hal Brands, "The Real Origins of the US-China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June 2, 2019,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6/02/the-real-origins-of-the-u-s-china-cold-war-big-think-communism/, 访问时间: 2019年12月29日。

③ MAD,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相互确保毁灭原则,也称共同毁灭原则。基本思路是在一方使用全面性核武器攻击时使用同等或更强力量反击,以确保攻击者和防御者共同毁灭,借由此双方维持一种紧张的和平。

④ Finbarr Bermingham and Wendy Wu, "China and US in New 'Cold War' that is 'More Difficult' than Soviet-era, Says Former US Ambassador to Chin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21, 2019, https://www.scmp.com/economy/china-economy/article/302973 5/china-and-us-new-cold-war-more-difficult-soviet-era-says, 访问时间: 2021年12月19日。

<sup>(5)</sup> Xuetong Yan, "Trump Can't Start a Cold War with China, Even If He Wants to,"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7,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worldpost/wp/2018/02/06/china-trump/, 访问时间: 2019年12月29日。

为根源与现在中国行为根源的差异,将避免世界陷入另一场冷战。" <sup>①</sup>格里高利·米特洛维奇(Gregory Mitrovich)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学者、《暗击克里姆林:美国颠覆苏联集团的战略,1947—1956》一书的作者,他认为:"我们并不处在一个针对中国的全球性冷战之中,我们也没有(面临)像柏林危机或者古巴危机那种可能升级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 <sup>②</sup>

"新冷战即将到来"的观点在 2018 年曾非常流行,到了 2019 年年底这种舆论开始弱化。虽然中美贸易摩擦于 2018 年 3 月爆发,并在 2019 年升级成为技术脱钩和金融冲突,但在这场冲突中,两国间的战略竞争更多地表现为国家利益的竞争,弱化了意识形态的直接对抗。尽管在过去 5 年多的时间里人们不断地预言新冷战将爆发,但新冷战并未如预期那样发生。人们开始逐渐相信,正在形成新秩序的世界并不必然导致冷战来临,但是有关这种新国际秩序的具体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的讨论并不多。笔者试图通过以下几个部分描绘这种新秩序的总体特征,并解释其形成的原因。

#### 二、分析数字影响的方法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我们需要掌握冷战时期和当今这两个时期共有的战略因素,否则就难以避免误将两个时期的共有因素视为导致这两个时期重大差别的原因。厘清共同战略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它们对这两个时期国际政治的相似影响。这些相似性的影响误导了人们以为新冷战即将来临。

两极格局、核武器,以及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是塑造冷战特性的三大战略因素。美苏两极格局促使两国争夺全球主导地位,并迫使其他国家分别与美国或苏联结盟。核武器防止了核国家之间的直接战争,但并不能阻止它们之间的代理人战争。意识形态冲突使得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都将对方视为邪恶势力,把消灭对方视作最高目的。

如今,中美竞争已经取代美苏两极争霸。此外,核扩散使得更多的国家

① Odd Arne Westad, "The Sources of Chinese Conduct: Are Washington and Beijing Fighting a New Cold War?" *Foreign Affairs*, Vol. 98, No. 5, 2019, p.87.

② Gregory Mitrovich, "A New Cold War? Not Quite: The U.S. Shouldn't Worry about a Cold War with China—Yet," *The Washington Post*, 21 March, 201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utlook/2019/03/21/new-cold-war-not-quite/, 访问时间: 2019 年 12 月 29 日。

开始拥有了终极武器。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与美苏也相似。因此,由这三个因素建构的冷战思维会对冷战和当今两个历史时期的外交决策都有相似的影响。这三个因素的存在可以解释冷战和当今两个时期的相似性,但是解释不了这两个时期的差异性。

为了理解冷战时期国家行为与当今国家行为的差异,我们必须考察冷战时期不曾存在的新战略因素。新因素可能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是西方国家内部的意识形态冲突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因此,本章将着重探讨国内意识形态冲突是如何降低意识形态对外交决策影响的,以及数字技术进步是如何塑造起数字思维并影响数字时代的外交决策的。

基于上述观察,本章提出三个假设:第一,当人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无关时,决策者们在决策时将较少关注意识形态;第二,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技术不断进步,数字经济和网络安全分别成为国家财富和安全的最主要方面,于是技术优势,主要是数字技术优势,将成为新格局下两个超级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第三,只要冷战一代仍然掌握着国家权力,冷战思维和数字思维就会对数字时代的外交决策产生混合影响。由于外交政策同时受到这两种思维的影响,因此国家间的互动将会塑造出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笔者称之为"不安的和平"①。影响对外政策制定和形成"不安的和平"国际秩序的因素见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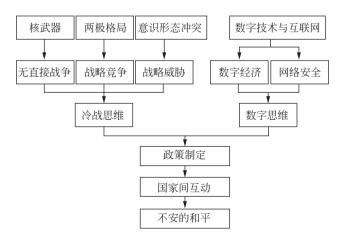


图 1-1 影响对外政策制定和形成"不安的和平"国际秩序的因素

① Xuetong Yan, "The Age of Uneasy Peace," Foreign Affairs, Vol. 98, No. 1, 2019, pp.40-46.

在当今数字时代,国家对外决策同时受到冷战思维和数字思维的影响。 冷战思维建立在意识形态的信念和偏见之上,而数字思维则是建立在对科技 力量,特别是数字能力的信念之上。数字思维是指从网络安全和数字经济的 角度看待和应对国际战略问题的方式。这种思维强调,在数字时代初期,网 络空间对国家生存的战略意义比地球上的物理空间(陆地、海洋和空气)更 为重要,而数字优势则会带来全球主导地位,这一地位建立在一个国家先进 的数字经济和网络安全之上。

由于不同国家的数字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数字思维对不同国家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就数字化程度而言,国家可以分为高数字化国家和低联网国家。各国不同水平的数字能力将导致不同的数字政策。总之,本章旨在厘清新国际秩序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当今大国政策制定的共同特征及其与冷战时的差异。

虽然笔者将数字技术进步视为塑造新兴两极世界特征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假定技术进步只能改变国际政治的内容和形式,而不能改变其本质,权力竞争仍是国际政治的本质。例如,中美两国在 5G 移动通信标准上的竞争和美苏争夺意识形态影响力的竞争,两者均由获得国际主导权所驱动。

基于上述假定和假设,下面将阐述两极化、核武器和意识形态冲突的影响,最后讨论数字技术的发展。依据前文,本章将重点讨论以中美两国为代表的大国对外战略,因为中美两国的战略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基于笔者对于数字时代下大国对外战略政策制定的理解,试图通过描述特征的方式,勾勒出新国际秩序的总体图景。在结论部分,笔者将不再对之前的各节进行总结,而是对我们所处的数字世界进行预测。

#### 三、两极化、核武器和意识形态冲突的影响

冷战思维与两极格局、核武器以及意识形态冲突三个因素紧密相关,本部分将考察这些因素的现状和影响。尽管这些因素仍像冷战时期一样影响政策制定,但是它们(尤其是意识形态因素)对于政策制定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与冷战期间相比,如今核武器的影响力因核扩散扩大了,两极格局的